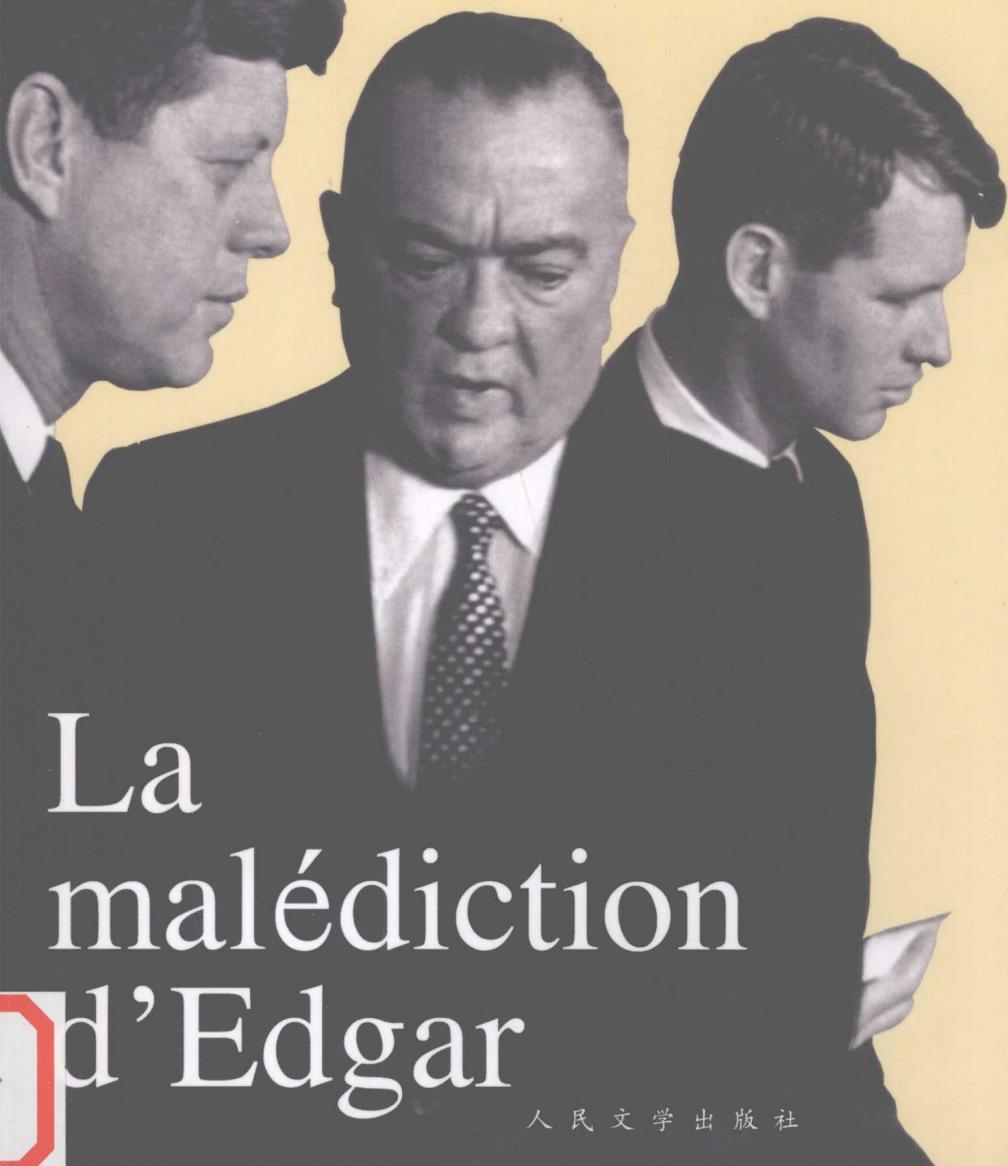


埃德加的诅咒

〔法〕马尔克·杜甘 著
周莽 译



La
malédiction
d'Edgar

人民文学出版社

埃德加的诅咒

〔法〕马尔克·杜甘 著
周莽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MARC DUGAIN
LA MALÉDICTION D'EDGAR

© Éditions Gallimard, 200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埃德加的诅咒 / (法) 杜甘 著；周莽 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ISBN 978 - 7 - 02 - 006215 - 7

I . 埃… II . ①杜… ②周… III . 胡佛, J.E. (1895 ~ 1972) - 生平事迹 IV . K837.127 =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91811 号

责任编辑：温哲仙

责任校对：韩志慧

责任印制：周小滨

埃德加的诅咒

Ai De Jia De Zu Zhou

[法] 马尔克·杜甘 著

周莽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e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市双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15 千字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9.25 插页 2
2007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8000

ISBN 978 - 7 - 02 - 006215 - 7

定价 17.00 元

马尔克·杜甘 1957年5月3日生于塞内加尔。专业为政治学和金融学，在金融业和航空运输业担任过各种职务，后从事写作。

第一部小说《军官的病房》，1998年在法国拉泰斯出版社出版，获得了18项文学奖，其中有书商奖、尼米埃奖和双猴奖，并在德国、英国和美国翻译出版。著名导演弗朗索瓦·迪菲隆将其改编为电影，荣获戛纳电影节两项凯撒奖。继《英国战役》（拉泰斯出版社，2000）之后，他的第三部小说《幸福得如同上帝在法国》于2002年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并荣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

责任编辑：温哲仙
装帧设计：康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前　　言

《埃德加的诅咒》的开篇，叙述者从出版商手中买下据称是克莱德·托尔森的回忆录，而手稿的真伪对于他来说并不重要，这便是这部“小说”的基调。这并非真正意义的历史传记，是杜撰之作，该书的扉页上印着“小说”字样。“小说”(roman)这个词在法文中最先出现是为了指称用罗曼语(roman)俗语写作的传奇故事、骑士传奇、亚瑟王宫廷的传奇，相当于我们传统中的“演义”吧。那么假托的托尔森回忆录就是对胡佛的演义，对近五十年美国政治史的演义了。

埃德加·胡佛可算美国政坛的“不倒翁”，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七二年近半个世纪当中一直稳居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局长位子，历经罗斯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诸位总统，没有一个人能剔除他。他攥着诸位大人物的“要害”，总统一届届的轮替，只有胡佛才是事实上的“终身执政”。他的权力来自他所掌握的机构“联邦调查局”。联邦调查局的前身“调查局”(BI)成立于一九〇八年，最初是为了针对西部巧取豪夺国家土地的行为。而当时有了汽车作为新的交通工具，跨州犯罪更为便捷，这一机构成立也是为了追捕跨州犯罪的罪犯。胡佛一九一七年进入司法部，在一九一九年美国一系列无政府主义恐怖袭击之后，他被委任调查局的情报工作对所谓“革命分子”进行大搜捕。一九二

四年，二十九岁的胡佛被提升为局长，此时调查局也改组为联邦调查局，所以胡佛可以说是联邦调查局的缔造者。胡佛制定了联邦调查局的行动章程，引入最先进的科学手段。三十年代禁酒令时期，联邦调查局有效打击黑帮，打击银行抢劫和跨州的绑架活动。对银行劫匪约翰·迪林格和“黑手党”阿尔卡彭的胜利让联邦调查局名声大振。一九四〇至一九五〇年，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主要是反间谍和国土安全，所针对的是纳粹和苏联。在胡佛半个世纪的传奇中，联邦调查局也在成长为深不可测的“黑洞”，负责反恐怖、反间谍、反网络犯罪、反腐败、保护公民权利、反有组织犯罪，据说现在已经拥有七亿份个人档案，二点五亿飞机乘客的个人资料。

克莱德·托尔森作为胡佛的副手，也是他的同性恋情人，此人行事低调，异常谨慎。美国作家楚曼·卡波特近年因一部同名电影而广为认知，作为同性恋者，他曾戏称联邦调查局的正副局长为“乔尼和克莱德”。马尔克·杜甘的《埃德加的诅咒》正是假托克莱德的口吻来叙述埃德加遗事。杜甘有高度的文字组织能力，利用人物对话、窃听录音和档案卡片等形式将众多角色罗织进文中。文中涉及到麦卡锡主义、梦露之死、处决罗森堡夫妇、古巴危机和猪湾事件、肯尼迪刺杀案、马丁·路德·金谋杀案、水门事件，甚至后来的里根总统也带写了一笔，在麦卡锡时期他曾是好莱坞的告密者。美国神话中的一个个传奇接连被戳破，我们只看到金钱、性、政治的无立场和伪善。最不堪的肥皂泡便是肯尼迪家族的传奇，也是杜甘落墨最多的地方。书中肯尼迪父子兄弟的形象，与我们近年在美国文化入侵下所营造起的肯尼迪崇拜有着极大反差，也是能引起阅读趣味的地方。虽然并没有揭露出更多更新的东西，关于梦露之死那一节仍让人吃惊。肯尼迪被描写为做秀高手，媒体时代的明星，传奇光环中的青年总统实际是性欲狂和政治低能儿，他终于被某种强大的美国力量所吞没。在主人公埃德加的口

中，美国便是眼前的大街和疾驰着的大排量汽车，还有想让这一切长久下去的人们。能源与霸权，杜甘的确是把住了美国的脉门。杜甘展示给我们的是利欲熏心的政客和被操弄的民众，虽然是托尔森的口吻，但似乎也表达出欧洲对美国的某种复杂情感。胡佛在政治上持极右立场，作者风趣地写到存在主义和嬉皮士运动在他看来都是一种新的共产主义。这位美国道德的捍卫者有着被迫害妄想狂的个性，他窃听所有人，抓住所有人的弱点，只因他是个压抑的同性恋者，他的秘密被黑手党掌握，他终生受其威胁，他不得不去掌握更多的秘密来制衡，而美国政治却在这两种暗中势力的消长中前进，也算是别致的美国政治史了。

作者马尔克·杜甘一九五七年出生于塞内加尔，后主攻政治学，成为航空公司的高层人物。有些传奇性的是，他最后技痒难耐，投入到写作中来，并取得成功。他废墨不多，所立的视角独特，诱人提出问题。译者对美国文化与历史涉猎不多，背景材料只能借助寻常工具书和互联网查阅，细节上难免粗疏之处，还望读者海涵。

周 莽

二〇〇七年二月

致

H.F.K.

“是否我们从消灭那些只有在台上才能呼吸的人开始！”

——齐奥兰

“当我将死之时，能否在行动中死去。”

——奥维德

“我留在了自我的门槛上，因为里面太黑暗。”

——安托万·布隆丹

序　　言

那一天上午，纽约城有着典型的坏天气。灰色，如暗色的罩布掠过摩天大厦的尖顶。寒冷的风调皮地打着旋，捉摸不定，猛烈地吹进那些笔直如墨线勾画的大街小巷。新闻播报透过玻璃传过来，回旋着，这玻璃将我与出租车的海地人司机隔开。我们陷入数目惊人的人丛里，他们一如既往地走向那些财富产生的场所。预报下午早些时候有冻雨，播音员因为这一情况而激动着，进一步谈到城市与周边交通瘫痪的危险。这是纽约在冬天某些时候的一个特色：在几分钟内，雨被风扫着在路面上散开，成为透明而阴险的一层薄冰，让行人与司机们动弹不得。人们得到建议要赶在下午早些时候离开城区，回到自己家里。因为预见到这一天被缩短，人们紧张起来。繁忙的城市仍旧将大家堆挤在那些大楼里面，几个小时之后将会把他们统统释放到新泽西州和康涅狄格州的公路上去。

我正情绪消沉。那个我要见的女人，她同我把约会定在了上午这么早的时候，迫使我在前一天就从新奥尔良过来，在一个离她的出版社不远的不怎么样的旅店花一笔钱住一夜。在这座四十年代的大楼下面，几个固执的人正赶在寒冷冻僵他们手指之前绝望地吸着最后一支香烟。她让我等了相当长时间，是为了提醒我这次会见是我要求的。她在一间逼仄的办公室里接待了我，由大堆的

书和出版物所造成的混乱与她穿戴的刻板形成反差。她突显出这个城市的颜色。这是职业女性的一袭灰色套装，就好像更加鲜艳些的色调会让人怀疑她的职业水准似的。疲劳的面色，无疑是每日奔波在曼哈顿城区和她的绿荫大宅之间造成的一——住房是奢侈品，也是沉重压力的来源。她的头发浓密，灰烬的颜色。她既不让人不快，也不让人高兴。与我们有关的一份厚厚的卷宗放在她面前，我感觉到她正在努力不显露出她的惊奇。

“您一直对此有兴趣吗？”她问我，却并不看着我。

“如果我没有兴趣，我不会在纽约变成一个巨大溜冰场的日子里从新奥尔良来陷在这里。”被她刻意的冷淡吓住，我有些无措地答道。

我所说的话意味着我离开了一个天堂，那就是新奥尔良。她从眼镜上边看着我，浮现出一丝冷笑：“许多南方人都不喜欢这座城市，因为他们对它缺少经验。如果您有时间在这里住些时候，您会看到它是多么热闹，有那么多让人感觉惬意的地方。这还是一座正在创造着的城市，在美国是绝无仅有的。”

“我并不是最好的裁断者”，我接着说下去，“我并不特别针对纽约，只是因为我不喜欢城市，在大都会里要有钱才能让生活变得可以接受，我没有钱。您本人，您在纽约的时间很长吗？”

“很少，我们住在康涅狄格州，离这里一小时五十分钟。”

我料到是这样。我接着说：“总是这样，那些最用力捍卫大都市的人，他们宣扬它的传奇，对它做着白日梦，但是无论如何他们都不会在这里建立家庭。”

“您当然是对的。”她松了口，结束了这次交谈。

她开始检查卷宗的每个文件，有点像一位初级法院的法官，他会在与被召人说话前整理一下文件。

“我们认定，这可能是一份假东西。”她抬起头重新说道。

“我的立场没有改变，但是是什么让你们这样认为呢？”

作为回答，她给了我一个笑脸，惊人地皱缩而且苍白，她开始说道：

“我们并不是一九七六年他所接触的头一家出版商，其他人，在我们之前，已经拒绝了这篇文字。是因为它不精确，如果不说是故事前后不一致的话。出卖手稿的人最后联系了我们，他是在他生命最后日子治疗他的那位医生的亲戚。我们没花多少钱就得到了它。”

“您不认为这些前后不一致是因为他写作时的年纪，是因为他的健康状况？”

“正是这一点最终说服我们买下它的。但是人们可能会惊奇，他某些回忆的准确是难以置信的，因为那些在据说他写回忆录的时期了解他的人，他们说他那时完全跟一棵蔬菜一样，终日躺在沙发里，在电视前吃甜食，好像是在试图通过糖尿病来自杀。从来没有人看到他写作。那些证明他退化的人，将他描绘为一个完全老态龙钟的人，他太过衰弱了，无法完成这样一项工作。而且，那些在他任职时每日与他来往的人，他们认为他是一个肥胖粗鲁的家伙，无法表达出细腻的东西，或许他任职的最后阶段除外。”

“那么为什么买下了这部手稿呢？”

“是因为我们的一位编辑，贾森·格林，是他当时主张的。我认为他那时喜欢这篇有些混合文体的文字，介于历史传记和看起来很真诚但有时有些丑闻性的忏悔之间，如今人们称之为纪实性的虚构作品。但是出版它的决定权是属于审稿委员会；除了贾森以外，当时所有的成员都反对。”

“出于什么样的理由呢？”

“真实性，就像我对您讲过的，人们疑心是否这是联邦调查局^①的某个人，职阶比较高的某个人写的。而且还有些风险，与对那两桩肯尼迪刺杀案的某些披露相关。您知道，在不久前，还有人因为对这一主题多嘴多舌而死掉，这里没有人想冒这样的风险。为了发表一些大胆的主题，必须要肯定获得的钱比获得的敌人多。而且一些假设的传播最终减损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好奇心。既然你感兴趣，它是你的了，要四千美元，这是当时我们花的钱。您有律师吗？”

“律师？”我窘迫地回答。四千美元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是一大笔钱。但是如果我请律师来处理这样价值的转让，我恐怕会花双倍的钱。

“这不是钱的问题。如您所知，这一主题一直是敏感的，我们已经准备了足够长的责任解除证书，但是如果您希望，您可以直接签署。”

在我看合同的时候，她将眼镜放在卷宗上：

“您不必答复我，但是为什么您准备为这部手稿花四千美元呢？”

在浏览文件条款的同时，我有些含糊地回答：

“我受一个独立制片人的委托在为拍一部关于这一时期的电影收集材料。”

“这不太新颖了，”她答道，“告诉我，奥利弗·斯通已经拍了一部不是吗？”

“是的。一部非常有趣的电影，但是只说明了多棱镜的一面。这项工作，由一个完全效忠 JFK^② 的团队完成的，是建立在正人

① 联邦调查局，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即联邦警察。

② 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的首字母缩写。

君子的调查基础上的，我指的是吉姆·加里森，他多少有些受到新奥尔良黑社会左右。约翰·肯尼迪的这些无条件的拥护者总想遮掩他的某些人格侧面，以使他成为一个偶像，让他的死变得更加让人震惊。然而，即使他被揭露得如同没有星星的夜晚那么黑暗，那也没有什么能说明谋杀他是正确的。不管怎样，我们并不是要拍一部关于肯尼迪家族的新影片。我们只是想探索我们历史中的一个阶段，在这个时期，在我们根本的羞耻心之中，迫害妄想、精神分裂、歧视女性、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是并存的。如同威廉·斯蒂伦所写的，这是‘在我们祖先的清教主义与大众色情上场之间的摇摆天梯’的时期。在电影中我们还会谈论权力，虽然这是一个有些过时的主题。说起来，您了解是什么使人成其为人吗？”

她似乎对这个问题感到奇怪。我赶紧明确说，说到人^①的时候，我的意思是人类。如果被错误解读，我的问题可能被看做一种性骚扰。她思索片刻才郑重回答：

“是道德，我觉得。”

“那是赫胥黎的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使用工具，对于柏拉图来说是两条腿行走。但是在所有这些答案中，亚里士多德的回答特别有趣。他认为人是唯一的政治动物。我将其解释为人是唯一拥有双重语言的动物。最后，抱歉用我这些理论来打扰您，它们有些……”

“您认为您能证明电影有足够的新颖之处吗？”

“新颖是一种奢侈品，历史可以轻而易举地摆脱它。就像本世纪的两场战争，它们成为一个广泛话题，宽广得就如同中西部平原，这个平原永远给新移民留下位置。”

我的离题开始让她厌烦。她有些生硬地将我带回主题：

① 法语中，男人也是这个词。

“这个计划有没有好莱坞参与？”

“就目前来说，这是一个独立计划，没有大制片商。将一种批判眼光投向我们历史的一个切片，这不属于他们当下优先考虑的。我们会试着应付，尝试找到一个吸引观众的艺术角度。既然观众不再对追寻真相感兴趣，那最好能从中得到乐趣，最坏的结果不过是感到厌烦，因为观众认定真相是不可企及的。除非是一些作假者提出一些离谱的说法，去讨好观众的善恶两元的倾向，去讨好他们的懒惰。他们安逸于这样的想法，认为自己是玩弄权术的少数人的牺牲品，是这些人在操纵着世界。就好像这种败类不是从他自己的种种矛盾中产生出来的……因为要想满足于一个唯一真相，这要求努力和自我牺牲，所以人们不能达到任何真相。”

她在短时间里表现出投入我们的争论，随后她的家务束缚又让她回来。

“我很抱歉，我本想留您吃午饭，但是他们预报有一场冻雨，我必须在这个地区完全瘫痪前去接孩子们。我的丈夫可能今晚从费城回来，我甚至不知道他是否能降落。也许下次再说吧。”

我们迅速解决了我们交易的操办手续，然后分手。

仍旧是在海地人开的这部载我去机场的出租车里，我想起最后一句话，“也许下次再说吧”。为什么说这句话呢，既然她知道没有下次？

连一行字都没有读过我就买下了这部手稿。假的，它与真的一样让我感兴趣。如果它是赝品，某个人或者某个机构想要建立这份文件的意愿本身就足以让我激动了。一位回忆者的所谓的客观性，与歪曲事实的意图一样，同样对真相是有害的。无论怎样讲，这份文件对于我的研究是根本性的。

我是在世界大战结束十五年后出生的。因太年轻而没有参加越南战争，我属于没理由抱怨的一代人。由于不断说服自己说，面

对功利性的犬儒主义抬头，我们曾袖手旁观，所以现在我们开始为此付出高昂代价，我明白了，在八十年代时二十岁，这也是一种真正的责任。因为对清算最近的历史我们表示了弃权，我们这一代人已经预备好了痛苦的未来。我也许是个悲观的人。这正是人们经常指责我们这些法裔路易斯安那人地方，指责我们将自己封闭在我们的怀疑主义的怠惰的安逸中，在其他人坚定地站在善的一边时我们却表示怀疑。

摄影师们喜欢在日出或者在夜晚降临前的这段神奇时刻拍摄照片。巨大的暗影赋予颜色一些特别的调子。这正是我面对这部手稿时所感到的东西。我品味着它，就像品味一个人黄昏时拍的照片，他正在被即将来临的黑夜催促着。